

打工子弟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

——以危机观察为视角

朱 洵 周彦汐

摘要: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通过“危机”视角观察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不同的发展阶段,提炼出打工子弟学校“社会网络构型”的一般化模型。此模型不仅展现打工子弟学校作为行动主体的一般特征,也突显其社会网络构型从生长、异动、稳定到博弈的阶段特征,进而使社会网络的动态化研究得到有益拓展。

关键词:打工子弟学校 危机视角 行动主体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构型

一、问题的提出

打工子弟学校的普遍存在,不仅是我国发展现阶段的一个社会现实,其形成、发展及走向,更为了解转型时期民间机构的社会网络及构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中观视角。打工子弟学校不仅是流动儿童学习与生活的场域,更是不断自我组织与建构的行动主体,将之纳入社会网络的研究视野,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时下,围绕“社会网络”进行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不胜繁多,但对其动态过程进行纵贯研究则相对缺乏。有学者指出,观察网络的动态发展不仅费时,而且纵贯研究存在困境(何雪松、陈继祥,2005:78-79)。笔者赞同此论断的同时,愿意提供一个可待商榷的原因,即观察视角的选取。以静态的“关系”为观察视角,往往难以觉察资源动员在网络形态中的作用机制,正由于缺少这一理解社会网络动态过程的向度(K, Ambrose Yeo-Chi,1991:63-84;Jacobson, David,1986:250-264),造成了动态研究的艰难。有鉴于此,以动态的“危机”为观察视角,也许是应对困境的有效方式:聚焦于“危机”事件的生成、传导、扩大、应对及解决,可以捕捉到不同时期下行动主体社会网络的“快照”(snapshot)(Emirbayer, & Goodwin,1994:1426),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剪切播排,“快照”将呈现为动态演化的“视频”(video)——社会网络构型,进而为纵贯性分析提供实证材料。

对打工子弟学校而言,危机时的资源动员可视为一种“事件性过程”,有学者指出,对此类“事件性过程”进行深度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实践的逻辑(孙立平,2002:95)。透过资源动员,行动主体社会网络的核心形态得以不断展现,这一形态既关联于危机生成要素,也蕴含着危机解决机制。捕捉每一个“事件性过程”中此类核心形态的快照,并对多个“事件性过程”一系列快照所形成的视频进行序列分析,行动主体实践的逻辑——打工子弟学校社会网络构型的一般化模型便在其中。这个抽象模型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以打工子弟学校为代表的民间机构的发展、维系及外部生态环境,也为后续研究提供“社会网络”演化形态的表征。

简言之,本文借助于一个个案的深度分析,捕捉打工子弟学校不同时期社会网络的核心形态(快照),并试图示范性地建立起社会网络构型(视频),后者的影像释放于前者按时序的呈现过程中,而“危机”视角的选取,则是动、静相宜的原因。

二、概念的辨析

(一)危机视角下的“行动主体”

“行动”是贯穿社会理论发展的核心概念。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以“行动”为研究的起点,将其划

分为四类: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行动以及传统的行动(贾春增,2000:105、110)。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注重社会系统整合的条件与形式,强化了系统分析与行动者分析之间的一致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去魅化”(disillusioned)，“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不再一致,社会学突然又陷入危机当中”,如何为行动者和冲突的整合定向,成为当代学者理论探讨的核心。图海纳在引入历史质(historicity)^①等一系列概念后,一种新的主体形象逐渐浮现:“当行动者处于历史质的层次,或处于生产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取向的层次时,他即是‘主体’……主体被理解为相对于社会世界的所谓沉默与陌生,也被理解为想接触他人和被承认为主体的欲望”(阿兰·图海纳,2008:3、5)。

伴随着各种概念范畴在理论探索中的竞争并存,经验研究中相关概念内涵的使用呈现多样化。在国内,有学者以行动为主线,在研究群体事件中提出“利益主导”与“价值主导”两种基本事件类型:前一类型中,主体的立场、态度和倾向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其应对策略基于理性需要;后者则以某种价值观(如社会公正)为基准,应对策略多受特定情境和心理因素影响(张荆红,2011:74-75)。另一些研究以主体为核心,以哲学意味的“主体”概念,指代从事着改造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发展自我的实践活动,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胡弼成,2008:66);并在形式上将主体分为个体形式、群体形式和社会主体等各种形式(周荫祖,1990:155)。

“行动主体”的概念,在理论上,着眼于对以往概念局限性的突破,即其界定不是根据支配和转变世界的的能力,而是根据主体自身与这种能力之间、与周遭世界的各种机制和话语之间的距离来界定(阿兰·图海纳,2008:6);在研究中,这个概念意味着不局限于基于某种目的而活动的个体,而将视域扩展至事件参与者的决策能力及资源动员上。简言之,无论个体、机构还是组织^②(政府),在对事件进行回应时,只要具备可辨别的行动策略,即可视之为“行动主体”。

在危机视角下,“行动主体”涉及了两大类:危机制造方与危机解决方。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行动主体”可界定为:面临各种困境,采取应对策略、进行资源动员解决危机的打工子弟学校;行动主体的形式为体制外的民间机构,其能动性的发挥可视为各种应对策略的采取,其行动类型可归为一种目的合理的行动,危机产生及解决的过程可视为一种利益主导型事件。“行动主体”在各种危机中,一方面不断进行着自我建构、自我完善,一方面也通过资源动员构建了动态的“社会网络构型”。

(二)危机视角下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这一术语最初由齐美尔引入社会学领域,在1908年发表的《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一文中,齐美尔将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米切尔(1969)将社会网络界定为“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科尔曼(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格里夫和福斯(Greve and Foss 1990)认为社会网络是指特定个人之间比较持久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时至今日,社会网络已超越个人间关系的范畴,行动者不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团行动者(商业公司、民族甚或国家),关系既包括把行动者连结起来的联系,也包括交易关系(领袖人物的共享、信息和群体成员的流动)(肖鸿,1999:1-2)。尽管学界对社会网络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强调特定时空范围内相对稳定的一种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雷如桥、陈继祥,2004:130)。

在涵盖范围上,社会网络往往与社会资本相对应,两个概念经常同时出现并交相定义,时或重合,时或包含,如何界定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视角。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有的则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还有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边燕杰,2004:137);也有学者明确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认为“社会网络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的、用来投资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但是不一定是直接的社会资本”(张文宏,2011:107)。对这些界定求同存异即可明确,在实体层面,社会网络所涵盖的范围不小于社会资本。

^① 历史质是指“一个社会通过各种冲突和社会运动,由各文化模式建构其实践的能力”。

^② 本文对个体以外的行动主体按体制内外进行划分,体制内的称为组织行动者,体制外的称为机构行动者。

由于危机视角的引入,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网络”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在外延与内含上都略有不同。与关注稳定相互关系的社会网络相比,本文的“社会网络”以危机为线索,展现社会关系不断被卷入时的核心形态;与对应于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相比,本文的“社会网络”覆盖范围更大,既囊括资源动员所构成的资源支持网络,也包含与其争夺空间的关系对立网络。由此,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可界定为:在影响打工子弟学校前途命运的一次危机事件中,不断被卷入的个体、机构与组织等行动主体之间交互的核心形态。

(三)社会网络构型

已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的精髓,在于把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表征为一定的网络构型,然后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动,阐述其对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意义”(李林艳,2004:68)。本研究不仅关注一次危机期间被不断卷入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更关注藉由多次危机所展现出“社会网络”的动态演化——“社会网络构型”。如果说,“社会网络”是一幅在危机时刻拍摄的快照(snapshot),那么,“社会网络构型”则是一段将此类快照按时间序列予以剪切播排的视频(video);“社会网络”展示横向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构型”呈现纵贯的发展逻辑。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构型”可界定为:个体、机构与组织不断被卷入学校生存与发展中的演化形态。

事实上,“社会网络构型”的动态研究需细分为两个层面。首先,对应于每一次危机,“社会网络构型”指的是被卷入要素的动员方式,即以危机为视角,以“行动主体”为中心节点,以社会卷入为连接链条,观察“社会网络”中有哪些潜在节点被纳入了网络,哪些节点发生了异动,从而勾勒出网络资源的动员机制。显然,这种分析深度要优于静态的社会关系分析,能够表达出“社会网络构型”的图示必然也同时表达出社会关系的状态,反之,由于缺乏对传导机制的考察,静态社会关系分析无法展示动态的“网络构型”。

在此基础上,对应于多次危机,“社会网络构型”意味着一系列网络核心形态(快照)的前后比照,不断展现出从生成、异动、稳定到博弈等演化形态(视频)的历时特征。对此进行纵贯性考察,可望获得“社会网络构型”的一般化模型。

下文个案分析部分是对学校“社会网络构型”第一个层次的展现,结语部分则是对“社会网络构型”第二层次的展现。

三、个案的选取

作为危机视角的观察对象,个案须适合展现民间机构在生存发展中的实践逻辑。布迪厄对于实践特征的分析值得注意,“实践本身所独有的特征是其紧迫性,通过紧迫性我们可以理解实践的独特性,以及静态结构层面上不具有的品格,而这种特性和品格在实践的活动发生之前是并存的。”据此,孙立平提出“过程——事件分析”,即通过“事件性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来发现实践的逻辑(孙立平,2002:94-95)。作为个案的危机事件给行动主体带来压力与紧迫感,使实践状态更为浓缩与集中,从而使对其的分析更加接近实践本身。^①

SR学校的生存发展史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个案,该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4次危机事件,完全展现出行动主体在紧迫状况下的资源动员机制、应对策略以及不断的自我建构过程。SR学校坐落在B城西一个旧货市场内,占地4824平米,其中操场2000多平米,建有19个教室,1个会议室,1个多功能教室,1个图书室,1个电脑室。体育设施有乒乓球台4个,篮球架2对。学校现有18个教学班级,学生803名,以小学为主,附设初中部。学校现有教职员工35人,其中专职教师29人

^① 此判断亦可参考孙立平所提出观点:“事件性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这是其一。其二,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链接与粘合,是一种生成的机制,是一种过程的再生产过程。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但‘过程——事件分析’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本身。”(孙立平,2002:95)。

(27人为中师、师专或幼师学历,2人有大学本科学历),门卫、食堂等后勤工作人员5人(学校内部资料-01)。从无到有,SR学校在13年的时间里历经5次搬迁、4次关停危机,才有了当前的规模,但作为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SR学校至今尚未获得办学资格。与多数民办学校类似,SR学校采用“裙带式家族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①在学校当前4名管理者中,校长A是副校长B的亲哥哥,是财务C的丈夫,只有主管教学的副校长D因教务经验丰富受聘而来,B与D入校时间均在2008年后,SR学校真正的决策者与创立者是A与C这对夫妇。

以上基本情况源于研究者自2010年9月开始持续一年有余的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及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聚焦于学校创建及4次危机事件过程,重点访谈校长夫妇A和C,并争取到部分其他涉事人的回忆,累计总访谈时间近30小时,收集到学校内部材料及当年的媒介报道23份,这些资料不仅显示SR学校是危机视角的合适观察对象,更为其“社会网络构型”提供了基本素材。

四、个案的分析

(一)“行动主体”的初步形成

SR学校的创立有赖于校长A在创校前的社会资本积累。

1. 创校的人脉积累

校长A、财务C1997年相识于SH小学(B城最早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当时,A的理想是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出国,C的理想是办学,最初想办幼儿园,后来打算办中小学。1998年,C离开SH小学,与几个老乡一起创办了自己的打工子弟学校,而A则一直忙于自己的学业,并在C离开不久后,也离开SH小学来到XZ学校(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在这里,他结识了未来对SR学校创立和发展极为重要的人物E。E来自农村,对农民的情况既熟悉又同情,从海军司令部的师级文职上离休后“在家闲不住”,当他了解到XZ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困难时,便受聘为XZ学校的校长,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将一个困难重重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E对A这个年轻人很器重,常常鼓励A“一起试着办学”(访谈记录20101108-ZXZ)。1999年,A终于下定决心,在本科只差一门课程就能拿到毕业证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自学考试,他找到C,希望能够一同办学。

2. 创校的物质积累

C答应与A一起办学不久后两人结婚,来自双方亲朋的借款成为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然而找到合适的校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校址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面积要足够大,采光和通风要好,像教室的样;附近要有生源;当地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访谈记录20101108-ZXZ)。寻找校舍很不顺利,因为“几乎没有房屋是完全按照教室面积来建造的,这样大面积的房屋往往是库房,而库房的采光和通风均达不到要求”,更何况出于生源的考虑,这样的校舍必须在“城中村”附近。因此,选址工作从1999年6月开始持续了2个月仍无进展,直到8月在FT区ZC庄附近,他们才找到一个合适的院子。逼近9月,开学的压力使A与C不敢耽搁,赶紧承租下来,正是如此仓促导致SR不到一年即面临首次危机。

3. 创校的人员积累

SR学校初创时,教职员工总共“6个半人”:校长夫妇A与C,一位中年女士L,外省某县两位年轻教师,一位做饭的师傅,还有XZ学校校长E作为顾问算半个帮手。L原在内蒙,作为随军家属来到北京,不久后其爱人转业至一个大国企,L便离开SR和爱人单位的同事合伙办校也成了校长。至于两位年轻教师的加入,则是紧挨SR的该县驻京办的推荐:“有两个年轻人在家教过书,能不能来你这呀?”(访谈记录20101108-ZXZ)。为了招生,学校所有教职员工全体出动在周围派发招生传单。由于学校初创缺乏知名度,招生中常常遭到质疑:“什么学校?在哪儿啊?”家长听了都不太

^① 关于“裙带式家族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参见朱志勇、徐蕾,2006:63-70。

放心。“有些当地居民不欢迎陌生人,看到来发传单非常不高兴,说些很难听的话,甚至把看家护院的大狗放出来,把我们赶走”(访谈记录 20101108 - DLS)。然而,A 和 C 明白,像他们这样新开的“黑作坊”,除了亲自发传单之外,确实再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增加说服力,增强家长的信任度,夫妻两人常常搭档一起去招生。就这样,SR 在 FT 区 ZC 庄办了起来,从默默无闻迅速地发展到 200 多学生,由于政策灵活,老师负责,渐渐地小有名气。

通过人脉积累、物质积累、人员积累,SR 学校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初步成形,并嵌入到民办学校发展可能遭遇的社会网络空间中,此空间的网络形态通过 SR 学校危机的产生及应对将得到清晰的显现。

(二)危机 1——个体行动者的卷入:房东欺瞒引发的危机

初创立的 SR 学校面临的首次危机是校舍搬迁,危机引发者只是一名个体行动者——房东。

1. 危机的产生

前已提及,由于合适的校舍难找,时间又紧迫,租赁合同非常有利于初创期的资金周转(月租 3000 元,且一月一付),ZC 庄的校舍是在仓促间承租下来的。然而,直到交了钱 A 才得知,为修路这个院子早已确定必须拆掉,且预定拆除时间近在眼前。其实,这个经转租再转租的院子,在附近已经租不出去,二房东隐瞒了事实,租给了一个急于办学的外来客。于是,刚成立的 SR 面临第一次危机(访谈记录 20101215 - ZXZ)。

2. 危机的应对

面对搬迁的要求,A 多次找到二房东,要求“无论如何把课上完”。对二房东来说,拖延搬迁日期多收租金符合其经济利益,于是二房东出面打通各方关系,使 SR 坚持办完了第一学期。在此之后,二房东又为 SR 物色下另一个校舍。这个离原校舍不远的小院子,房子不多但租金不低,一年 5 万,半年一付,这对初创的 SR 来说负担颇重。以第一学期收 90 余名学生、每人 300 元学费计,一个学期也只有 2 万多元的收入,交完房租将所剩无几。A 由此对坚持办学产生过动摇,但想到学期末已收取 30 多位学生的书费,停办将意味着对这些家庭的背信,A 咬咬牙,“逃跑了不行,贵就贵点吧”。于是,2000 年 2 月春节后,SR 带着近百名孩子,搬迁到新的校舍。新的校舍属于生产队,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只有 3 间教室,房东出钱加盖了 2 间。一年后,学生大量增加,校舍容纳不下,又不得不搬到 ZC 庄的一个老年活动站(访谈记录 20101215 - ZXZ)。

3. 初创期 SR 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

从危机 1 的生成及解决机制中,可以勾勒出图 1^① 所示的社会网络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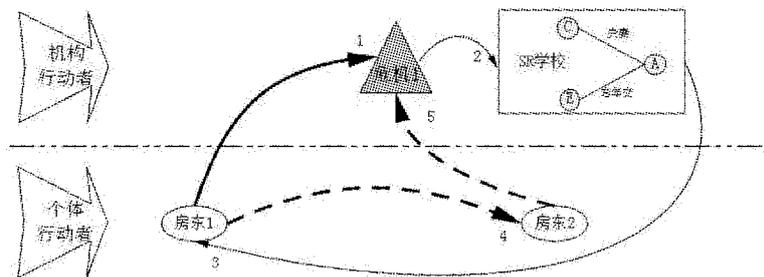


图 1 个体行动者的卷入

从链条的传递途径看,SR 学校初创期的网络构型可以表述为:

① 在本图及以下各图中,危机以三角形表示,个体行动者以圆形表示,机构行动者以矩形表示,组织行动者以五边形表示;危机制造方位于图示左半部分,危机解决方位于图示右半部分;危机生成链条为粗实线,压力传导链条为细实线,危机解决链条为虚线。

链条1——房东隐瞒事实,将一个要拆迁的房子租给SR,引发危机。

链条2——此危机将“失去校舍”的压力传导给SR。

链条3——承受此压力的SR向房东施压,希望能维系已签的合同。

链条4——房东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SR物色到新校舍。

链条5——新校舍房东同意租房给SR,危机得以解决。

从静态层面看,图1涉及主体较少,线条的连接也很简单。从动态层面看,危机生成途径只有链条1,危机解决途径为链条4→链条5,这说明,刚起步的SR在社会网络空间中遭遇的危机成因简单,作为行动主体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较单一,即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另一行动主体“房东”身上寻求突破。

(三)危机2——组织行动者的卷入:政府执法引发的危机

经过两年积累,SR学校逐渐获得口碑、较稳定的生源、教师及校舍,步入稳定发展轨道,但其所在地FT区政府的“态度”,使SR成为诸多面临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1. 危机的产生

打工子弟学校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之一,面对这一新兴的民办机构,不同区域的政府在管理理念及政策执行上有较大差异:如FT区不允许无合法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而相邻的HD区则相对“宽容缓和”。A对FT区“不允许存在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的理念感到“可笑”,对此理念下的执法行为至今记忆犹新:

“2001年9月,FT区来人宣布,SR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要求立即解散,‘你这个学校是非法办学,限几月几日前关闭’,‘你是哪个地方的人,身份证拿出来’,我不是很配合,没给他们报,反问‘你有什么资格查我们’,于是区里转而去我们的房东,要求房东提前终止合同(原租期两年,改为一年)。我和C着急了,办学许可证我们申请过,教委说我们办学条件不合格,学校位置不固定,安全设施不健全,师资水平不过关,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能颁发办学许可证。可我心想,没有办学许可证是‘非法’办学,可普及义务教育也是法呀,总不能让这些农民工子弟没有学上成为文盲吧?反正办学校不是干坏事,已经开学了,学生杂费和书本费都交了,也许能侥幸把这学期上完……11月25日,周日,我去师大听讲座,C在学校。FT区有关部门来人强行拉走了所有的课桌椅,一共用卡车来回拉了10趟,还把C带回派出所直至晚上才放回来,我和C的身份证、暂住证也被没收了。后来我与其他学校的校长前往‘农政科’要桌椅、要说法,没有见到负责人……后来,相关部门又采取锁门、停电,联防队员堵校门等方式,给办学制造各种困难。”(访谈记录20110105 - ZXZ)

2. 危机的应对

面对FT区的“零容忍”态度,SR学校首先采取了拖延策略,并坚持到学期结束。这种拖延策略的有效实施,主要依赖于以下原因:

就这样,连桌椅都没有的校舍里,400多名孩子蹲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课,C又向老乡找来100多张桌椅,临时借给学生学习用,但仍不够,有些学生只好在自己膝盖上读书写字。如此将就了一个多月,提前放假。事发后B城的报纸详细报道了此事,A至今保存着这些“证据”：“那些孩子当时都七八岁,长大了肯定还能记得那个景象。”(访谈记录20110105 - ZXZ)

“附近的公办学校收不下这些孩子,家长也负担不起借读费,让孩子去离家远的学校家长又不放心,于是最后大部分家长还是坚持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上学。”(访谈记录20110105 - ZXZ)

FT区的“零容忍”政策得到了严格的执行,SR的拖延策略只能是暂时的,如果学校想要继续发

展,就必须搬出 FT 区。下一个校址选在哪里, A 与 C 很长时间里“心里没数”,直至一名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信息,让他们找到了方向,“学校搬到那里(HD 区 SW 桥)完全是一个意外,当时学生家长中有一个四川人,经常拖欠学费,我们(A 和 C)都觉得这人不靠谱,但就是这个不靠谱的家长,说 SW 桥有房可租”(访谈记录 20110105 - ZXZ)。SW 桥离原校址 ZC 庄仅一桥之隔,不过二三公里,但由于已脱离 FT 区属 HD 区,当 A 表示不在 FT 区办学后,相关部门甚至发还了桌椅,此后再也没来找过麻烦。至此,由政府执法引发的危机告一段落。

3. 稳步发展期 SR 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

从危机 2 的生成及解决机制中,可以勾勒出图 2 所示的社会网络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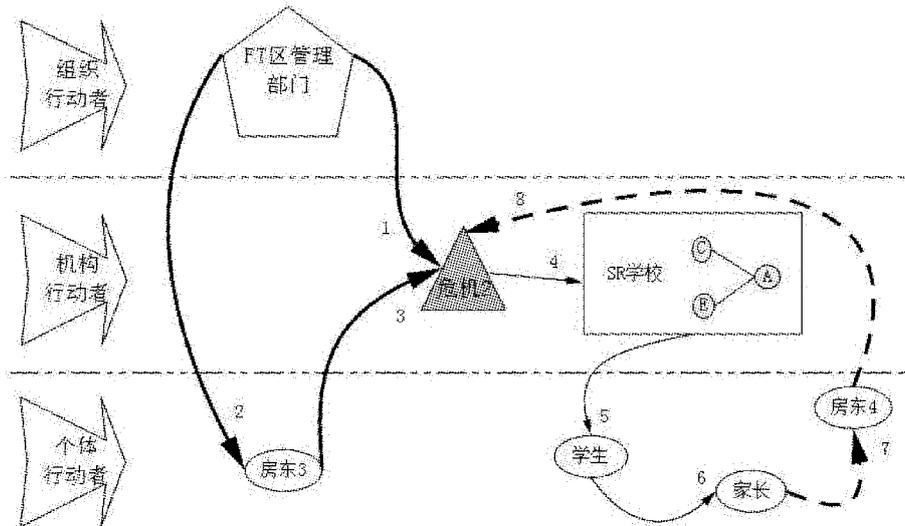


图 2 组织行动者的卷入

从链条的传递途径看,SR 学校稳步发展期的网络构型可以表述为:

链条 1——FT 区管理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高压政策,危机产生。

链条 2——FT 区对 SR 的高压政策难以贯彻执行,转而向 SR 的房东施压。

链条 3——受政府影响,房东要终止租赁合同,加剧了危机。

链条 4——危机将关停压力传导给 SR。

链条 5——SR 的关停压力传导给学生。

链条 6——学生的辍学压力传导至家长。

链条 7——家长为 SR 物色到一个新的办学地点。

链条 8——新房东同意租房,危机得以解决。

从静态层面看,图 2 涉及的主体个数较图 1 为多,主体层次也扩展至组织行动者一级,但总体而言线条连接仍较简单。从动态层面看,危机生成途径为链条 1→链条 2→链条 3,危机解决途径为链条 7→链条 8,这表明,稳步发展期的 SR 学校在社会网络空间中遭遇的危机成因趋于复杂,作为行动主体的 SR 应对危机的策略途径虽然没有加长,但与危机 1 相比,此时的 SR 不仅表现出采取策略的主动性,还体现出快速有效获得信息资源的组织性,这大大提高了 SR 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

(四) 危机 3——社会情境的影响:非典型性肺炎引发的危机

HD 区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执政理念,用校长 A 的话来说是“绝对的和气”(访谈记录 20110307 - ZXZ)。这种柔和态度使 SR 学校从搬迁的无奈中迅速恢复,2002 年春季重新开学后进入更为快速的发展期,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使蒸蒸日上的 SR 面临新的危机。

1. 危机的产生

“非典”在2003年夏季爆发,当时SR拥有学生近500名,教室狭小学生密集,管理、防治、医疗保险等方面远不及公立学校,这使SR一直承受着“非典”高危易发的极大压力。此外,作为尚未取得合法办学资格的民办学校,SR成为非典时期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即使态度柔和的HD区政府也不例外——相关部门到SR查看工作时对A说,“学校能不办就别办了”,虽然语气是商量性的,但这种倾向性态度对SR产生了很大的关停压力(访谈记录20110307 - ZXZ)。

2. 危机的应对

“非典”给学校造成的直接压力,以及政府施加的间接压力,使SR学校再次面临关停危机。非典期间,A仍在师大求学,他将学校面临的困难告诉同班一位澳籍华人同学F,F社会资源丰富,帮A找来师大教授给HD区教委“打招呼”。A在打过招呼后拜访区教委,接待他的是一位科长W,“说话很客气也很和气,直说‘没事儿没事儿’,临走还把我送出门”——这使A至今印象深刻,后来果然“没事儿”(访谈记录20110307 - ZXZ)。随着“非典”乌云的渐渐散去,第三次关停危机也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3. 非典影响下SR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

从危机3的生成及解决机制中,可以勾勒出图3^①所示的社会网络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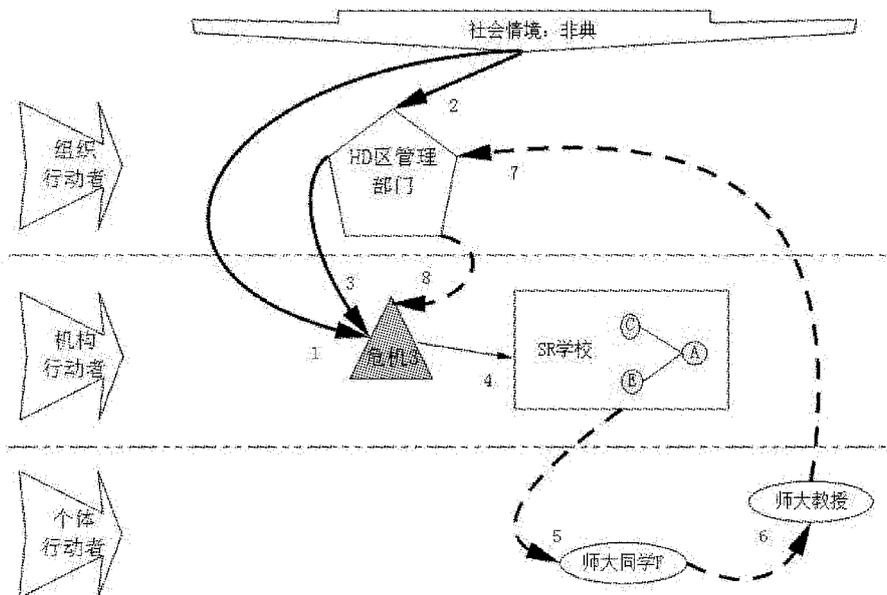


图3 社会情境的影响

从链条的传递途径看,非典对SR学校网络构型的影响可以表述为:

链条1——非典的社会情境对所有行动主体产生直接影响,SR当时拥有学生近500名,教室狭小学生密集,管理、防治、医疗保险等远不及公立学校,承受了非典高危易发的压力。

链条2和链条3——如何应对非典,政府的决策至关重要,在这种压力下,关停资质条件无法达到应对非典危机的、人群密集的机构(如学校、企业)是应有之意。政府的政策取向加剧了SR面临的危机。

链条4——危机产生的压力传导至SR

链条5——通过个人关系网中,A向师大同学F求助。

^① 将HD区管理部门置于图示中间,是为了表明其既是危机制造方,也是危机解决方。

链条6——F寻求师大教授的帮助。

链条7——师大教授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与有关部门打招呼。

链条8——有关部门解决了关停危机。

从静态层面看,图3涉及的主体个数并不多,线条连接也很简单,但相比前两次危机,社会情境的影响成为主要因素被涵盖进来,这对SR学校所在的民办学校发展场域是一种丰富。从动态层面看,危机生成途径为链条1→链条2→链条3,危机解决途径为链条5→链条6→链条7→链条8,这表明,这一发展阶段的SR在社会网络空间中遭遇的危机成因更加复杂,同时,SR的应对策略不再局限于“叫板”(危机1)和“挪窝”(危机2),而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危机享受“打招呼”的好处,这不仅行动主体不断自我发展的结果,也是潜在社会资源运作能力有长足进步的表现。

(五)危机4——利益集团的博弈:城市改造引发的危机

SR学校在HD区SW桥不仅渡过了非典危机,也渡过了一段“最消停”的办学岁月,然而未能久留,2003年末,由于LS路的修建,学校被迫搬迁到办学环境较为宽松的SJS区YM口。历经3年休养生息后,2006年由于生源扩大校舍不足,A和C决定租用附近旧货市场内一片面积为4824平方米的土地,租期10年,投资60多万(自有积蓄30万,向亲戚朋友借款30余万,不是法人单位故不能向银行贷款)在新校区建校舍。按A和C的打算,建成后新校舍将办成初中部,原校舍为小学部。然而,2006年8月,新校舍尚未建成,由2008奥运会引发的城市改造使得SR的办学戛然而止。

1. 危机的产生

2008奥运会的申办,对国民是个利好,可对遍及B城各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却是个意料之外的利空。自2006年7月起,B城各区教委陆续下文,取缔“非法”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在一片人心惶惶中,7月10日,主管教学的副区长来到SR学校参观指导,这位L姓的区领导对SR学校的成绩进行了肯定,说“这学校可以办”,但“要注意安全,不要招外区的(学生)”。A感觉“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也自觉没啥问题,就没去弄,主要在看”。然而8月,区教委宣布取缔的学校名单中SR赫然在列,整个YM口地区唯有HA学校得以保留。不久取缔名单有所调整,但YM口地区没有任何变化。A很不理解,“区领导都说可以,怎么说关就关了呢?”从经济上说,SR此时无法停办——教材已垫钱购买,房租已交到年底,这些费用都需要靠下学期的学费填充,而管理部门显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8月26日,SR开学,学生来了400多人,SJS区16个部门联合执法,一时校园里停满各种车辆,工作人员在校门口张贴通报,在课堂上对每个学生声明SR办学非法,给每位家长发通知要求将孩子送入其他公立学校或有资质学校就读。SR的办学无法正常进行,只好“偷偷摸摸上课,不断地打游击”。此时,房东也加入施压行列,“如果再上课,房子要被铲掉了”。在建新校区的工头听说SR要停办,“一天到晚追着要工程款、材料费”,A举债投资,刚播种就绝收,让A“连死的心都有了……上天安门闹,啥都想过”(访谈记录20110420-ZXZ)。

2. 危机的初始应对

历经多次危机,SR已懂得临危不乱,抓紧动员其社会网络中的潜在资源。7年的发展使SR学校在当地教育界小有名气,这给了A与教委谈判的底气,然而当A自己去找区教委协调时却没有效果;于是A找到国务院XX中心XX部,这个体制内的单位曾将SR列为帮扶对象,捐赠过篮球架(篮球架损坏后A没舍得丢弃,自己掏钱换了篮板和底座,至今仍立在校园中),作为三农专家的部长亲自给区教委打招呼,“这是我们的帮扶对象,学校办的不错,有不合适的地方改进一下”,可仍然不管用;A又请来教育界的老前辈FM老先生(陶行知(陶行知)的学生,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FM老先生80多岁了,亲自过来求情,那个(职成科)科长才30多岁,居然对老先生很蔑视”,“(对他来说)老先生过时了,(只知道)紧跟副主任,你说这人是不是二百五?!”(访谈记录20110420-ZXZ)。能动用的资源,SR学校都进行尝试,但均未收到理想效果,在与执法部门对峙10天后,2006年9月4日,SR同意不再办学,将500多名学生及20多位老师尽数转给附近唯一没被取缔的HA学校。人去楼空的SR校舍空空荡荡,房租却不能不交,A和C设法把校舍租给住

户居住以抵房租,没想到房东却要起了赖皮,“房子只能做学校用,其他用途一律不允许,不让办学校又不怨我”。为了阻止 A 和 C 出租房屋,房东把水停了,把电停了,还不时过来把房门、玻璃砸了,“房子是我的,我想砸就砸”(访谈记录 20110420 - ZXZ)。多方的步步紧逼使 SR 陷入了困境, A 敏锐地觉察到此次危机背后潜藏着利益合谋。

3. 危机背后的利益合谋

凭借办学 7 年的社会网络累积,即便在备战奥运城市改造的社会情境下,SR 学校也已具备运作各方资源应对政府压力的能力。然而,与以往面对的各次危机不同,这次“SR 是被校长(HA 学校校长)、科长(SJS 区教委法规科长)、地主(大队管地皮出租的)、房东(校舍房东)4 个人联手做掉的”。“校长”是卖馒头的出身,舍得在处理关系方面花钱,“科长”的住家装修就是“校长”给办的,“校长”自己还扬言:“钞票我只送新的,旧的我都不送。”“校长”将 SR 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于是借整改之机请“科长”坚决取缔 SR,最终获得了 SR 所有的学生和教师,这便是不久前还曾得到区领导肯定的 SR,在取缔过程中却毫无回旋余地的原因。“科长”曾是一位教师,“地主”是她的学生,“地主”与“房东”则是酒肉朋友,当初正是“地主”把 SR 校舍这片地设法划给了“也不顾家也不结婚”的“房东”。于是,这 4 人在“做掉”SR 上达成了共同利益:“校长”釜底抽薪除掉 SR 获得生源,“房东”提前终止合同占有 SR 出钱盖的房屋,并以高价重新出租,另两人在促成此事中获取好处(访谈记录 20110518 - ZXZ)。

4. 危机的终极应对

在诸多现实困难面前,2006 年这场取缔风波并没有持续太久。事实上,SR 学校刚停办,SJS 区即要求不再逼迫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为此,A 颇为懊悔,觉得当时若放假几天躲过风头,学校或许能继续办学。更重要的是,A 从利益合谋的打击中得出教训,“在 SJS 区的 3 年太无风无浪,以为环境安定,没注意打点关系,结果一旦出事就缺少强力支持”。2007 年初,新校舍(原计划的初中部)建成,心有不甘的 A 和 C 打算在此东山再起,在吸取教训后更着意借重本地资源。通过新地主——旧货市场老总的介绍,他们结识了本地某足球俱乐部的老板。爱好足球的俱乐部老板,有意选拔和培养一些足球苗子,经撮合,双方决定合作,以足球俱乐部为名挂牌招生,既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培养足球苗子。由于足球俱乐部不归教委而归体委管辖,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办法绕开了禁止办学的教委。心知肚明的教委自然不相让,工作人员装成家长给“俱乐部”打电话,声称自己孩子要上学,套出“俱乐部”招生的实情后,亮明身份指出这是非法经营必须关闭。但背靠老总(旧货市场)和老板(足球俱乐部)的 A 不再那么没有底气,尤其俱乐部老板“也是个大流氓”,“到教委拍桌子,不办也得办”。于是,停办半年之久的 SR 重又招生,只是没了学校的名字,挂上了足球俱乐部的牌子。2007 年 3 月“俱乐部”开学时,学生数达到 300 人,其中 100 多学生是从 HA 学校转学回来的,原来的老师也陆续回来任教。2007 年 5 月,另一所在取缔风波中迁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MTG 未能逃脱被取缔的命运,七八十名学生有待接收,出于对 SR 的认同,MTG 学校谢绝了 HA 学校每个学生给 50 元的提议,将学生免费转给“俱乐部”,“俱乐部”学生数由此达到近 400 人,慢慢开始恢复元气。2008 年,“足球俱乐部”悄然摘牌(家长普遍不愿交纳 100 元的足球培训费,俱乐部早已有名无实),“SR 学校”的牌子在消失两年后重见天日,并逐步发展至当前的规模(访谈记录 20110622 - DLS)。

5. 博弈中 SR 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

从危机 4 的生成及解决机制中,可以勾勒出图 4 所示的社会网络形态:

从链条的传递途径看,SR 学校博弈中的网络构型可以表述为:

链条 1——确保 2008 奥运成功举办的压力作用于政府,政府采取城市改造等政策。

链条 2——尚未取得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软硬件设施确实较差,影响城市整体形象,政府陆续下文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危机形成。

链条 3——“校长”、“科长”、“地主”、“房东”结成利益集团,以将 SR 排挤出打工子弟教育市场为目的,加剧危机。

链条 4——危机产生的关停压力传导至 SR。

- 链条5——SR求助于曾对其进行帮扶的国务院XX中心。
- 链条6——国务院XX中心某部长为SR向有关部门求情打招呼,没有效果。
- 链条7——SR求助于教育界前辈FM老先生。
- 链条8——FM老先生亲自去找有关部门商谈,以失败告终。
- I'、I''——解决危机的尝试均失败,SR只能暂时关停学校,并将500多名学生及20多位老师转给HA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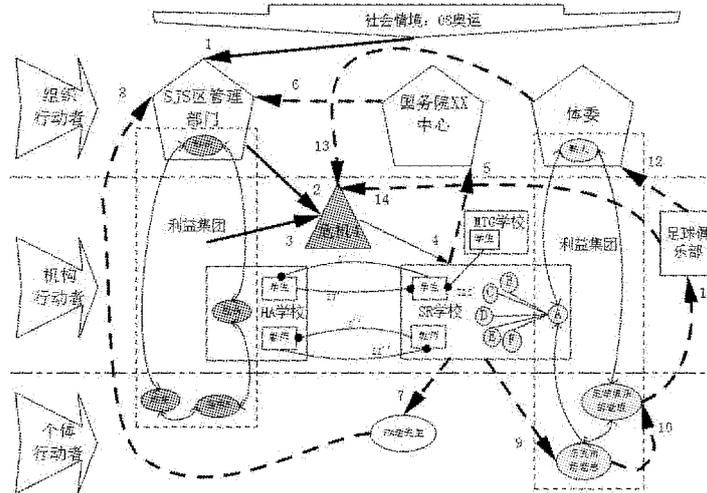


图4 利益集团的博弈

- 链条9——不甘心就此关停学校,依托新地主(旧货市场老总)SR打算东山再起。
- 链条10——东山再起需要解决资质问题,通过新地主结识了一名足球俱乐部老板。
- 链条11——SR与俱乐部老板合作办学,以足球俱乐部为名挂牌招生,既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培养足球苗子。
- 链条12——足球俱乐部资质的审批上报体委。
- 链条13——体委同意俱乐部的设立,SR由此绕开教委得以重新开办;教委曾采取措施阻挠,但在俱乐部老板的斡旋下,最终不了了之,至此,危机得以初步解决。
- II'、II''——“俱乐部”正式成立后,之前转给HA学校的学生与老师出于对SR的信任,离开HA学校,来到“俱乐部”。
- III'——即将被取缔的MTG学校出于对SR的认同,拒绝HA出钱争生源的做法,免费将七八十名学生转给“俱乐部”。
- 链条14——“俱乐部”成立之初招收学生300多名,陆续获得从HA学校、MTG学校转来的学生和教师,SR逐渐恢复元气,步入正轨,以校长A、旧货市场老总、俱乐部老板、体委某“熟人”结成的利益集团,彻底巩固了SR的生存状况。

从静态层面看,图4涉及的主体个数相当多,线条连接非常复杂,主体的层次涵盖了个体、机构及政府组织,也突显出社会情境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图4基本囊括了SR学校在社会网络空间中可能遭遇的主体类别及关联,是对民办学校发展场域较为详尽的勾勒。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涵盖个体行动者、机构行动者、组织行动者三个层次的利益集团(参见图4虚线矩形框),当危机制造方的利益集团对SR这一机构行动者施加压力时,SR被迫关停,直至危机解决方形成涵盖三个层次的利益集团,SR才得以借壳重起。从动态层面看,危机生成途径为链条1→链条2→链条3,危机解决途径为链条5→链条6→链条7→链条8→链条9→链条10→链条11→链条12→链条13→链条14,这显示了SR面对危机所采取策略的多面化与复杂化,突显出行动主体在能动性上的大幅提升。

五、结语和讨论

综合考察危机视角所得的4幅网络构型图,可以抽象出打工子弟学校社会网络构型的一般化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展现出作为网络中心节点的行动主体的一般特征,同时能够突显打工子弟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从生长、异动、稳定直至博弈的阶段特征。

(一)行动主体的一般特征

处于社会网络中心节点的行动主体,在自我建构中展现出两个特征:

1. 能动性的增殖

在创校初期,作为行动主体的SR学校遭遇房东欺瞒引发关停危机时,仅有最为朴素的应对策略,即“叫板”——向危机制造方直接施压以应付危机;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展,当面对政府执法引发的危机时,SR已拥有两种应对策略,一是“谈判”——与危机制造方协商,二是“挪窝”——依靠潜在社会资源寻求新的办学条件;到非典所引发的危机时,SR有了“打招呼”的能力——请第三方介入危机,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最后,在应对2008奥运引发的危机时,SR已具备动员组织、机构、个体等多层次社会行动者的能力。譬如,SR成功地获得国务院XX中心的关注,成为其帮扶部门,进而成为其应对危机时可动员的资源;成功地获得其他民办学校的尊敬,进而在MTG学校解散时获得其生源;成功地获得教育界前辈及当地实权人士的支持,进而借助其力量东山再起。更重要的是,此时的SR已具备“抱团”——组建利益集团的能力,这使其能更为充分地调动社会网络的潜在资源,更为有效地分散竞争博弈中的压力。简言之,行动主体的社会网络构型伴随着能动性的增殖,体现在日常中是潜在社会资源的不断增长,体现在危机中是应对策略的日益丰富。

2. 行动的取向

在应对四次危机的过程中,SR学校秉持打工子弟理应享受义务教育的立场,向政府部门申诉自身生存之必要,向社会各界寻求自身发展之需要,对其行动取向的研判,不妨与同为民间机构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有研究指出,中国非营利组织通过为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方式,达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其行动既有价值追求,又有行动目的和现实手段的权衡,属于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统一的行动(王冠,2010:8)。相比而言,SR的危机应对举措以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而生存发展中对经济的考量明显多于教育理念的实践,因而归根结底属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但其行动在具有目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因其社会效应而具有价值合理性。事实上,这种行动取向正显示出打工子弟学校作为一个时代性产物的特征,即其存在基础是大量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需求不能通过现有教育体制得到满足,一旦这种教育需求的总量减少,或被其他途径加以解决,就会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之,打工子弟学校无法坚守一种持久的价值和信仰,而只能依照市场逻辑给教育事业以有益补充。

统言之,在危机生成及解决这一利益主导型事件中,行动主体一方面通过能动性的增殖进行着自我建构,另一方面通过目的合理性行动争夺生存空间。

(二)社会网络构型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网络构型的一般化模型涵盖四个发展阶段:生长、异动、稳定及博弈。

1. 网络构型之生长

(1)递进式的社会卷入。“危机1”由个体引发,在进行资源动员时,也只涉及个体层次;“危机2”中组织行动者卷入了社会网络;“危机3”突显出社会情境对各层次主体的影响;“危机4”则是在社会情境的强烈影响下,所有层次主体持续卷入的复杂博弈过程,博弈的双方都出现了涵盖组织行动者、机构行动者、个体行动者三个层次的利益集团。

(2) 危机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多。“危机1”的制造方只涉及1个主体,解决方亦只有1个;“危机2”的制造方涉及2个主体,解决方3个;“危机3”看似制造方只有1个,解决方3个,但不能忽略受“非典”社会情境影响的各层次主体;“危机4”的制造方则涉及4个主体,解决方主体数量达到8个。

(3) 危机链条的加长。“危机1”的生成途径及解决途径均各涉及1段链条;“危机2”的生成链条达到3段,解决链条为2段;“危机3”与“危机4”,虽然生成链条上加长不明显,但解决链条分别达到4段和10段。

2. 网络构型之异动

网络构型生长过程中伴随着节点(主体)的异动。被卷入网络的主体的作用并不始终如一,随着社会情境的影响或潜在资源的动员,在利益的导引下,其作用的大小甚至方向都可能发生变化。譬如,“危机1”的房东1既是危机制造方,也促成了危机的解决;“危机2”的房东3原是SR学校的支持者,但在高压下提前终止合同加剧了危机;“危机3”的“非典”社会情境中,HD区管理部门并不只是危机制造方,也发挥着缓解危机的作用;“危机4”中发生异动的节点更多,SJS区管理部门对SR的态度由表扬变成了取缔,原校舍房东为了更多收益由支持走向了对立,MTG学校则由竞争者转而成为支持者,旧货市场老总、俱乐部老板、体委的“熟人”则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不断加大对SR的支持力度。网络的异动可以归结为: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3. 网络构型之稳定

网络构型的生长及异动达到一定阶段,自身会逐渐稳定下来。网络的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网络中的节点数量,二是节点在网络中的权重。前者意味着,网络的稳定依赖一定数量的节点来维系,若网络节点数目过少,则任何两个节点间连接的断裂都将严重影响网络的形态。譬如,在“危机1”中,整个网络只涵盖3个主体,若SR与房东1的连接发生断裂,则危机可能无法得到解决。后者意味着,网络中的各节点对危机生成或解决所起的作用并不一致。譬如,在4幅网络构型图里,组织行动者的影响效果要明显强于其他节点。这可以理解为,打工子弟学校大都没有合法办学资格,由于缺乏体制的支持,经济、政治、文化资本均有所欠缺,面对危机通常只能求助于社会资本,由于办学受政府多个部门管辖,政府在其社会网络中往往处于顶层,因而成为其资源动员的诉求对象。一般而言,社会网络构型的稳定性通常由规范和信任来维系,但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社会网络构型中,政府作为规范的制定及执行者,成为整个网络稳定性的主宰力量。

4. 网络构型之博弈

“危机4”的生成机制较为复杂,其解决也动用了SR学校几乎全部社会资源。与前3次危机相比,危机制造方率先结合成利益集团,由于涵盖所有三个层次的行动主体,甫一出现就使SR陷入四面楚歌的重重困境,SR的初始应对仍采取分别调动各层次行动主体的老办法,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最终被迫暂时关停。当SR意识到对手不是某个单独的行动主体而是跨层次的利益集团时,组织己方的利益集团成为当务之急。“抱团”策略使SR“钻了个空子”得以东山再起,采用“挪窝”策略而未能及时组建利益集团的MTG学校则被排挤出局。在接下来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由于拥有与对立面旗鼓相当的所有三个层次的行动主体,SR成功抵挡住各方压力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抽象而言,行动主体为争夺稀缺资源结成利益集团,使已经稳定的网络产生大幅振动,在博弈中优胜劣汰形成新的网络形态。打工子弟学校的社会网络就在这种生长-异动-稳定-博弈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演化形态——一般化的社会网络构型。

(三) 讨论:对结构与结构主义的超越

打工子弟学校存在于社会空间之内、社会结构之外,是城市化进程中民间机构的典型代表,在危机视角下,其社会网络构型展现出图海纳行动社会学所强调的“主体性”:首先,于社会尊师重教的普遍传统与城市管理部门的严格执法之间,在义务教育法强调“人人有学上”与现实困境“打工子弟上学难”的鲜明对比下,行动主体发现了机会空间;其次,行动主体在经营社会网络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策略空间,在危机应对中努力边缘成长;最后,与斯科特所谓“弱者的武器”不同,打工子弟学

校并非以消极的低姿态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而是以“合情合理”与“既成事实”为手段,积极打开上升空间。当社会结构对弱势群体的种种限制以危机的方式爆发时,行动主体展现出以行动超越结构的勇气,以其功能的必要和不可替代,逐渐获得了边缘存在的半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重塑结构的尝试。

这样一片视域,恰是那种依赖于既有软件,仅关注网络密度、层级、相依性及嵌入性的结构主义网络研究方法的盲区。危机视角下的社会网络构型,并不试图像结构主义那样建立起一套网络运作的规则,它更着眼于捕捉那些周边的、动态的社会联结,尝试探索网络过程及因时而变的结果差异(马汀·奇达夫、蔡文彬,2007:146)。换言之,社会网络构型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正在于将传统视野中社会网络的聚焦点锁定于行动主体,将观测时点锁定于危机时刻,在每一次危机中捕捉一张以传导链条勾勒网络核心形态的快照,将一系列快照编辑为展现行动主体演化形态的视频。

参考文献:

- 阿兰·图海纳,2008,《行动者的归来》,商务印书馆。
-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胡弼成,2008,《教育主体评议》,《大学教育科学》第2期。
- 贾春增,2000,《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雷如桥、陈继祥,2004,《集群网络研究:一个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经济问题探索》第12期。
- 李林艳,2004,《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社会学研究》第3期。
- 马汀·奇达夫、蔡文彬,2007,《社会网络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孙立平,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陶红、杨东平、李阳,2010,《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分析——基于我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教育发展研究》第9期。
- 王冠,2010,《行动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学会》第9期。
- 肖鸿,1999,《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荆红,2011,《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社会》第2期。
- 张文宏,2011,《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上)》,《江海学刊》第2期。
- 周荫祖,1990,《试论主体及其主体性》,《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朱志勇、徐蕾,2006,《社会资本在民办学校发展机制中的运作逻辑:个案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4期。
- Emirbayer, M. & J. 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9.
- Jacobson, David. 1986, "Type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 27.
- K, Ambrose Yeo - Chi. 1991, *Kuanshi and Network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Doedalus.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施芸卿